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重要文献

——重读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第一次提出了“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著名论断。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形势下，重温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著作，对于我们系统了解从严治党的历史、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认识都有重要意义。

□ 沈传亮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写作时间是1929年12月，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当时，毛泽东撰写古田会议决议，有着比较复杂的革命背景。虽然这篇文献着眼于纠正军队内党存在的错误思想，实际上也是在纠正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毛泽东在文章里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这在党的文献中是第一次。

写作缘起

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显然，这是写作这篇文章的主要背景。

实际上还有更为广泛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对红军中党组织的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和深入思考。毛泽东领导了三湾改编，朱德、陈毅在南昌起义后也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党和部队的纪律性、团结性、战斗力等方面都有明显进步。但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未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有严重分歧。争论焦点是红四军党内要不要设立军委，表面看是组织机构设置，实质上涉及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这与军队内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纪律性不够有较大关系。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写了长篇文章就此开展探讨，提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红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他指出，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去克服这种思想。可惜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观点并未得到多数同志认同。6月22日，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前委书记一职落选。9月下旬，前委在上杭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继续就建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但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争论三天依然毫无结果。

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上当选为前委书记的陈毅到上海汇报工作时，把红四军的情况向中央做了实事求是的说明。这一情况得到中央重视，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共同研究这一问题。在反复研究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基础上，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简称《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并指出：“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的领导岗位。随后，毛泽东开始着力解决军队内党存在的错误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作这篇大文章，实际是要对红军建立以来军内和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并谋求统筹解决。

写作思路

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特别讲究谋篇布局，围绕问题层层展开，主要针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八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简要而深入的分析。

文章首先对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进行了总体判断，认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这实际上明确了红四军党内错误思想的阶级基础以及领导弱化的原因。展开论述时，毛泽东就每个错误观点进行了单独分析，既指出错误观点的表现，又分析错误观点的来源，更有解决和纠正的方法，逻辑清晰，方法得当。

例如，对极端民主化的分析，毛泽东首先对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进行了分析，接着提出了纠正极端民主化的方法。一是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毛泽东认为，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致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致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思想。二是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毛泽东的思路是：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基础。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旦形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这种分析，不仅有可操作性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对今天我们严肃党内生活、加强组织纪律性都很有启发。

另如，对非组织观点的分析，毛泽东分析了非组织观点的两种现象，一是少数不服从多数，二是非组织的批评。对第一种现象，纠正的方法是：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党的纪律之一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意见被否决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非必要时下一次会议再讨论，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第二种现象，毛泽东认为要让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针对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毛泽东认为，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这一分析同样体现在他对主观主义的分析上，毛泽东认为批评不能仅仅注意小的方面，要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说话要讲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再如，对于个人主义的分析，毛泽东首先对个人主义的表现，从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六个方面进行了介绍，批评了有人只注重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集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狭隘的个人主义。纠正的方法，毛泽东认为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


古田会议旧址

主要特点

关于纠正党内各种错误的方法，毛泽东特别注重思想和制度紧密结合。无论是在分析个人主义、盲动主义，还是在分析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时，他都强调要加强党员教育、着重从思想上肃清错误。在分析如何纠正主观主义时，毛泽东在党内第一次提出了“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重要论断，并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从制度上纠正错误，如他提出要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行为；要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等。

此外，这篇重要文献不仅从方法论角度告诉我们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还有一些重要思想值得思考和坚持。比如，毛泽东指出，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重要任务。这实际上明确指出了红军的任务，影响了以后的革命实践。再如，毛泽东特别强调批评时不要攻击个人、盯住小的方面，要着眼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批评。这对当下我们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都有很强的指导性。

重读经典

心学与实学：共产党人信仰自觉的有力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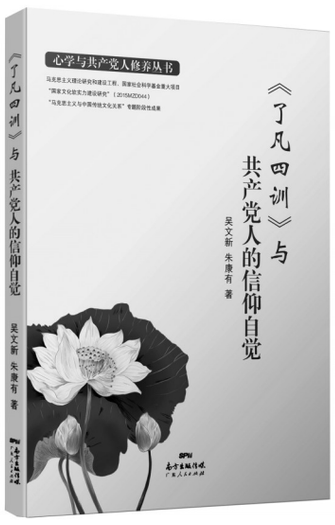
□ 王 杰

从个人到整个人类命运的走向，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人们总在发问：命运究竟能否改变并趋向人所希冀的美好方向发展？明末《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基于个人的亲身经历，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一个道理：因循命运，不做极大的努力，就会受定数摆布；如果痛下决心，真正、真实改过立善，命运就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我想，这不仅对个体生命的优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民族和国家命运前途亦有重要的启示。

在命运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值得推崇的是改命论、造命论——把命运引向善的方面，且发展至明末清初确有一套可操作的手段和途径。不只有思想家王船山提出的“造命”之论证，还有当时流传于民间的“功过格”。没有认识、无法掌控的“命运”确有其神秘性，而深刻把握了命运，就会出现“生死由我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自由自主自控意识。这时候的“命运”，可以理解为生命有机体在时空中运行的有形或无形的轨迹，高度的自觉能够使人们在生活中驾驭它以完成更高的目标。在理想社会状态中，个人的命运将和人类的命运具有共振性、契合性。

袁了凡揭示了中华民族积极命运观中一整套心性修养的方法，对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很大的启示和一定的教育意义。在2015年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则直接点明：“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这些论述，对于提高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党性教育就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论断隐含了对传统美德的参鉴。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中华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有共通之处。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和濡染，让党员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党性”落实到自觉的“德性”上，把党性修养与具体的生存情境结合起来，把外向式的改造世界与内向式的“反求诸己”即改造自我融为一体，真正做到“经世致用”的“实学”要求、“知行合一”的“心学”标准，把“心学”与“实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意思的是，《了凡四训》亦将内心的克制修养称作“实学”。如说“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曰俟，则一毫觊觎，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试想一个人不动心念到如此圣贤境界，这种修身养性之道还不是实实在在、切身受用的人生学问吗？我们今天讲共产党人的“心学”可以超越“阳明心学”，而成为共产党人修身养性、党性修养之学。但党性修养的核心依然是共产党人的心性修养、道德修养、理想信念的修养，古圣先贤有关心性修养的道理和方法，其实也基本适用于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正如《〈了凡四训〉与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指出的：党性修养不是课堂上讲出来的、考试考出来的、开会开出来的、作报告作出来的、写论文写出来的，而是切实地通过戒慎恐惧、改过积善、敬畏道德法纪、为民创业造福等实践出来的！为此，共产党人似乎也该有自己的“功过格”“功过簿”，除了自己记录和自我监督之外，组织制度上亦可以如此设计，以便促进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时时惕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严谨慎独。深入挖掘《了凡四训》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之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意的阐释，不仅对普通人优化生命运动、掌控自己命运有借鉴价值，而且对共产党人强化党性修养、形成信仰自觉有借鉴价值。



《〈了凡四训〉与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一书从分析《了凡四训》的道德修养入手，结合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论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这样一个重大课题。该书深入浅出的释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操作性：作者不是泛泛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而是选择价值信仰这样一个特定角度，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命运学说的积极意义，厘清了笼罩在命运观上的神秘乃至迷信的成分，达到了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大力挖掘和充分发挥中华文化中道德和信仰资源的深刻内涵和滋善润德作用，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培植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的目的。

本文系作者为《〈了凡四训〉与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吴文新、朱康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版）一书所作的序言，发表时略有改动，题目为编者所拟。

序与跋

梁庄之后

——读《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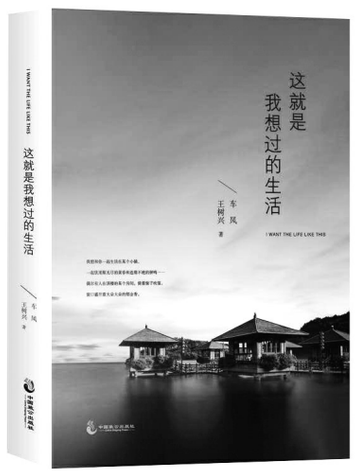
□ 沈 辉 宋丽丽

这些年，一些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非虚构作品，常以大变革中农村、小城市社会剧变为题材。从梁庄式的落寞留守到再也回不去的涪陵白鹤梁，大多表达的是忧伤与哀痛。文化学者车凤和作家王树兴合著的《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对这一惯常手法作出了新鲜的反拨：在新一代社会大迁徙大流动之后，在城镇化进程中，建设新的社区、创造新的生活，未尝不是在打造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精神寻根之旅。

中国社会传统中在意“故土难离”，重“叶落归根”，崇尚“衣锦还乡”，讲究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中，位于福建省惠安县西部聚龙山麓的聚龙小镇也许就是这些新移民的最美之“方”。我们经常在人口管理工作中看到一种统计数据，分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而聚龙小镇的居民们，很难用这种惯分法描述，更不能用所谓“流动人口”来定义，小镇的人已经结束“流动”，突破了根深蒂固的原乡情结。说他们是新移民，是因为这个小镇居民来自数个国家、国内数十个省份。大家拥有不同的身份、收入和文化教育背景，但有一个共同点，最终在聚龙小镇安居，心有归属。一位小镇居民总结得好：在这里，有动物、植物、土地、家人、朋友和爱。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家王树兴和车凤博士全方位参与到居民的日常活动中去，倾听和了解小镇生活细节，积累了大量素材，梳理与解析小镇被热爱的个中深因，当然作家本人也毫不掩饰对小镇生活的热爱，文字基调明朗如小镇上空的蓝天白云。虽是非虚构，但通过作品，我们完全能体会到作家的立场：这些小镇居民亲近的土地与环境，是新的乡土，新的气象，是主动选择自我营造的乐土。那些回眸故乡涕泪横流的离怀别绪，那些进城之后仍作弱势群体的孤寒无助，被这些小镇居民们喜出望外的奔走相告、开开心心共建新家园的炙热情怀取代了。

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那些对于庸常人际关系架构起来的安全感的留恋，在小镇被生生捏碎了。年轻一代组成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或各种文体社团，老中青少皆参加志愿者组织，业主一大车一大车捐赠时鲜蔬菜，甚至有人捐赠活禽，每天都有来回摆渡的爱心顺风车，每年端午中秋都有“百桌千人邻里宴”，这些不是临时作秀，而是日常生态。“小镇没有陌生人”，是一种全新的理念，这个大社区重构了小镇的社会组织、人文生态、文化秩序，他们主动编制了自治契约，人人自律、他律，割除了熟人社会病，居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基层政府部门作为多元主体共同发挥作用，成为一种新的社区治理范式，这才是小镇可持续性发展最重要的内在支撑。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其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都是不可逆转的。放弃刻舟求剑式的呆板或许才有诗意栖居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我想过的生活》完整展示了聚龙小镇作为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内在魅力，为社会大变迁、人口大流动提供了有启发意义的参考。

在聚龙小镇，无人是孤岛。我们看到的是人际关系和社群制度的解构与重组，是为消除认同焦虑而积极主动建构的新型社区文化格局。爱心义工社、文明督导团、全程自助购物自助结算的信用良品店，物管人员的勤政聚会，业主们每天组团诵读传统文化经典的活动，学校、书院、音乐文化等各类场域发挥的作用，无一不在言行、精神上塑造着和主导着新的小镇人格，这是一种新鲜活泼的创造力旺盛的民间源泉。

人类学家布尔迪厄曾说，作为超个人的社会文化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社会结构和个人的关系在实践中互动，实践中的人们又在某种程度上再造了文化和社会秩序。每个人的血脉都流淌在无法切割的传统中，又带着自己的前史来到新的生存地，其能够增加新的内化和外化的重要载体就是浸淫其中的文化，聚龙社区文化既是手段，也是新的目标，培育出新的社区习性，自觉涵养着新的家文化和社区文化，通过多元化的兼收并蓄形成了新的“小传统”，不断给小镇建设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本书中展示的人们对于小镇五千多户居民大社区的认同感、凝聚力，体现了对原生家庭、原始故土的执念的超越。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设想，在有破有立的时代，那些千千万万个梁庄后人们，走出家乡之后成为新移民，像蒲公英的种子漂泊迁徙，有的上升，有的沉落，如果有更多的人真的“已经回不去了”，他们中无论是打工者、生意人，还是教师、大学生，等等，能否愈合离乡背井的伤痕，或者也可以平等自主地参与到落脚点的社会治理中去，换一种新人生姿态，选择另外一个聚龙小镇，营造新的生活、新的人生、新的家园？这难道不是一种崭新的乐观的选择？

这应该是我们乐见的梁庄之后。

书而思